

奧地利學派理論的新進展

黃春興 2016-0520

讀者必然從第一部分介紹的主要人物或第二部份的方法論理解到，奧地利學派（以下簡稱奧派）若從結構言是以方法論主觀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生產的時間結構為三核心，以第三部分介紹的議題和概念為保護帶，並以社會主義之經濟計算和經濟週期為最主要的應用理論。

這學派的發展過程是典型的文化演化，各代學者除了傳承薪火外，也針對時代議題提出解釋和解答，免不了和其他學派發生激烈交鋒。交鋒可以讓學者反省自身體系的完整和適用性；若有不足，則加以修補或發展。於是，在每一個時點，奧派都有著已經成熟的理論與概念，同時也有著較為生澀的理論與概念。前面各章已經綜述了成熟的紅蘋果，本章將在有限的篇幅下簡述幾個生澀程度不同的青蘋果。

轉型經濟學

早在 1920 年代，米塞斯就否定了社會主義之經濟計算的可能性，但並未能改變當時學界的認知。即使後來哈耶克加入辯論，學界依然在 1950 年代誤判奧派失敗。到了 1990 年代，隨著共產主義國家在政治與經濟徹底失敗後，他們才全面承認奧派理論。

遺憾地，奧派在全力批判社會主義時，卻未展開重建理論或轉型理論。論原因，一則是 1950 年代的學界誤判和同時期凱恩斯主義的興起，重挫了奧派的發展，二則是奧派在 1980 年代復甦時，耗費太多精力於內部爭議。如果奧派當時已把轉型理論準備好，就不會在重建時期失去發言權。結果，新古典學派和新制度學派取得了發言權，直到東歐和俄羅斯的轉型出現困難，奧派才開始補課。

新古典學派是在不涉及制度變革的前提下，從兩個角度去討論轉型問題。其一是假設技術不變，定義轉型為資源配置點的移動，尤其是從生產可能範圍之內部移到更具生產效率的生產可能前沿 (PPF) 上。這角度的議題大都落在管理或

行政管理的執行面，著重於生產誘因、資訊不對稱、軟預算等問題。其二是讓轉型帶動生產方式的變革，從農業或勞動密集產業轉向到高科技或資本密集產業，以尋找新的核心產業或調整生產可能前沿為議題。這角度主張轉型乃是政府的任務，在能控制的範圍內逐步調整計畫中所設定的生產方式。這兩類專注生產效率的變革很快就遭遇到改革瓶頸。

新制度學派認為轉型就是改變約束人們行為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規則。定義上，這即是財產權制度的改變，尤其是生產組織之產權制度的改變。他們持科斯的論證，支持任何對原有產權制度的變革，但未把目標設定在純粹的私有產權制度和純粹的市場經濟。在中國，經濟學者在 2000 年代支持鄉鎮企業、蘇南模式等各種混合產權制的論述可作為代表。

奧派的立場接近新制度學派，只是更明確地要求轉型必然是要從社會主義體系邁向市場經濟。譬如彼得·伯特克 (Peter J. Boettke) 就清楚地提出三點原則：(一) 轉型問題不應只討論經濟問題，也應探討政治和法制的轉型；(二) 政治和法制上的有效改變，必須清楚陳述政府行為的新約束以及具有可信賴承諾的改革內容；(三) 討論轉型時必須明講出發的“這裡”和期待抵達的“那裡”。具體地說，轉型就是以私有財產權制度和市場規則去取代現有的體制與規則，包括保障私有財產權和市場機制所需的政治和法制的改變。(Boettke, 2001, 2004)

這類關注於轉換體制內容之論述，就如新古典理論的比較靜態理論，和奧派核心觀點的差距還不小。恩里科·科隆巴托 (Enrico Colombatto) 在加入“時間”與“無知”的奧派成分後，將轉型定義修改為“引進和維護新的制度和組織所需要的一段期間”。“在這段期間內，不論是普通的人們或政策的制定者或政府的行政人員，都必須學習新財產權制度的運作，並適應那些至今還不甚明白的遊戲規則。”他引用哈耶克的觀點，把知識的獲得、市場的自由進出、個人責任等視為轉型理論的主要議題。(Colombatto, 2002)

然而，誠如勃特克所指出的：如果我們看到俄羅斯還存在著龐大的地下交易市場，或看到中國繼續遵循著各類的潛規則進行經濟或政治交易時，即使政府在法令上宣布採行新的制度，我們依然無法說轉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成。也就是說，非正式規則的落實比正式規則的推行更為接近轉型的核心。非正式規則的落實仰賴個人對新制度的認知、認同、和心理的計算。余赴禮便從主觀論角度定義轉型為：社會的知識庫正發生急速變化的一段時期。此時，存在人民心理的詮

釋架構已經過時，不能夠應付外面世界的急速轉變，但又未建立新的詮釋架構去應對新問題。(Yu, 2003, 2011)

“社會的知識庫”就是哈耶克說的“分散在社會中的知識”。有效率地利用它們是經濟學終極的議題。哈耶克認為市場的競爭機制提供了個人有效率地利用社會知識庫的平台，但前提是市場機制所需要的規則和個人對些規則的信任、理解與遵循都已經內化。因此，余赴禮認為轉型探討的問題是：個人如何將已內化的信任、理解與遵循的對象，順利地從一套熟悉的規則順利地轉移到另一套陌生或尚未形成的規則？他認為奧派至今在這方面的研究還甚少。當個人開始解放自己原先的信任、理解與遵循後，並不是面對另一套可以明確可用的新規則，而是重返回原初秩序下的社會。人們可以繼續以舊規則當作新制度下的潛規則，但這些潛規則本質上已經無法有效率地用以發現或創造新世界的利潤機會。當然，人們也可以直接從其他社會學習他們的規則，但那等於假設了他們的制度正是我們社會的終極發展目標，而這假設違反了演化結果不可預知的論述。誠如余赴禮的提醒，我們不必過於留戀舊制度，也不必避刻意去拷貝西方制度。那是等著我們去探索新利潤機會的未知世界。(Yu, 2003, 2011)

企業與組織經濟學

奧派在 1980 年代復甦之前並沒有獨立的企業理論，也沒有著手建構的蛛絲馬跡。誠如尼古萊·福斯 (Nicolai J. Foss) 說的，“正是奧地利學派參與了社會主義之經濟計算可能性的大辯論，阻礙了他們的一般性洞見在企業理論中的應用”。直到 1994 年，福斯還認為“現在仍然是這種狀態”。他不僅認為奧派是企業理論的先行者，還認為奧派理論可以改寫當前的企業理論。其理由可就兩點來說。第一，門格爾的貨幣演進理論是以比較制度的方法論切入，而科斯的企業理論也是從比較制度切入。比較制度分析成了奧派和新制度學派的接隼，讓奧派可以將核心理論應用到企業理論。第二，奧派批評新古典理論時所強調的市場過程和企業家精神，也是科斯企業理論所缺乏的。因此，奧派並不缺可以建構企業理論的基材。(Foss, 1994)

由於列寧說過國家可以是一家大企業，而科斯又重複說了一次。自從大辯

論之後，奧派就一直對企業理論懷有戒心，對科斯的批判也不少。為了克服這障礙，福斯引述哈耶克於 1945 年的論述，重述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是在地性知識，而它們經常屬於默會知識。雖然哈耶克指出這些知識的充分利用決定了社會的經濟效率，也指出市場是最能發揮這些知識的機制，但並未清楚說明市場利用這些知識的方式，而這些如何利用的技術正是科斯用以論述企業存在的空間。(Foss, 1994) 雖然科斯使用的概念與語言是交易成本，但也可以從知識的有效利用去解釋。(Langlois, 2013)

企業家利用市場是有成本的，但其經營企業的內部成本也會呈現邊際遞增，就限制了企業的成長規模，即使是很大的集團企業。市場同時存在許多的複合生產的企業，它們的員工擁有個別的知識，尤其是默會知識。它們透過交易以利用對方擁有的知識，並藉以改進自己的產品。這是以哈耶克之知識論為基礎 (Knowledge-based) 的企業理論。(Langlois, 2013) 默會知識內嵌在個人身上，霍爾庫姆 (Randall G. Holcombe) 認為每個企業都是儲藏其員工之默會知識之寶庫。市場有利於個人知識的充分利用，但在當代，許多複雜的產品必須直接地利用多人的知識才能完成。這時，企業便具有比較優勢。(Holcombe, 2013)

奧派建構企業理論的另一進路是以資本財為基礎 (Capital-based)，認為企業的主體是擁有資本財的企業家。企業家若缺乏資本財，也是徒具企業家精神。這進路也是從哈耶克之知識論切入，然後轉入異質資本財理論。福斯把默會知識對應到新制度學派的特殊資產，而最常提到的例子就是為特定產品而投入的特殊資本設備或特殊訓練的人力資本。當企業內部存在特殊資本財，邏輯上就不難引申到路德維希·拉赫曼 (Ludwig Lachmann) 所強調的異質資本財。換言之，這進路是從奧派的資本理論去建構企業理論。(Lewin and Baetjer, 2011)。

城鎮發展經濟學

計畫經濟的思想並未隨 1990 年代社會主義的失敗而銷聲匿跡，反而分成兩支流，變身為新型態的微型計畫經濟。其一支流將原本全由政府負責的計畫分解為政府承擔的“計畫階段”和委託民間執行的“興建與營運階段”，此即所謂的

“民間與政府的夥伴關係” (PPP)。譬如台灣高鐵的 BOT 案就屬於 PPP 的一種。在 BOT 方式下，高鐵仍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財，不過政府只負責打通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法案審查。法案通過後，此公共財就委託民間企業負責興建與經營。政府可以不減損原始的計畫目標，繼續推動各項計畫方案，同時也免除籌措財源與經營管理的雙重負擔。當民間在興建或經營中出現弊端時，政府可藉機將失敗責任歸罪於市場機制的無能與貪婪。

另一支流將全國性的計畫經濟化整為零，分割為規模較小且同質高的計畫對象，如當前流行的社區營造、城鎮計畫、城市更新、環保計畫等。哈耶克在《自由秩序的原理》中曾討論到城鎮的規劃問題。他認為城市生活因居家緊密，若財產權制度的分割過於簡單，自由契約經常無法解決鄰居效果帶來的爭端。(Hayek, 1960) 這問題在當代稱為“逆共有地之悲劇” (Tragedy of Anticommons)，意指過度分割的私有財產權不僅無法有效率地發揮資源的生產力，也時常會發生財產權之間的使用衝突。(Heller 1998) 譬如在一棟財產權分層擁有的老舊大樓，就存在急於拆樓重建之財產權所有者與不願拆樓重建之財產權所有者間的權利衝突。這衝突非市場機制能解決。若不欲政府權力介入，就只能重新調整私有財產權結構，譬如在法律上要求每棟集體居住而分層擁有之大樓，必須在使用超過一定年限時，以多數決方式決定是否要拆樓重建。

城鎮發展問題範圍甚廣，如科斯就認為像下水道系統和道路系統一樣都是城市不可或缺的血管。當城鎮向外圍擴張時，不論是下水道系統或道路系統，是否需要先行計畫？還是只要城市發展到哪裡，再讓市場機制跟上？哈耶克認為，可以將城市土地的控制權區分為開發規劃之“大區域先決權” (superior right) 和決定使用方式的“小區域次要權” (inferior right)。(Hayek, 1960) 霍爾庫姆說他可以接受政府對於大區域之道路聯絡網的規劃，至於道路修建和工業區與商業區的選擇就應該完全交給市場去決定。(Holcombe, 2004) 如果政府隨意規劃，只要市場力量沒完全被壓制下來，遲早都會修正這些錯誤。(Lai, 2004)

勞動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沒有企業家，把勞動力視為和資本與土地類似的角色，亦即在給定生產目標和勞動市場決定的薪資率下，依邊際法則決定最適需要量。該學派雖把勞動者的服務來源由勞動力提升到人力資本，微觀的理論架構並沒改變。當勞動者擁有更高的教育與經驗，在宏觀經濟理論上也能推動經濟成長。為了讓經濟成長持續，他們採取“做中學”或其他機制以維持人力資本的持續累積。(Lucas, 1988)

奧派對勞動者參與生產的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視勞動者為專業於提供勞動力的行動人，傳統上其提供的服務偏向於以體力為主。然而，勞動者作為行動人，也擁有他自己獨立的目標、意志、和企業家精神。新古典學派也承認前兩項，但由於理論過於關注生產目標的實現，遂以負面角度去看待，認為在資訊不對稱下，勞動者私下的行動會偏向私人目標。於是，代理人問題和誘因機制設計便成了主要的研究課題。的確，代理人問題存在於所有的組織，也是米塞斯最初批判社會主義之經濟計算可能性時所持的角度。但他以正面角度看待行動人的獨立目標與意志，不認為“中央計劃局”有能力壓制行動人的意志而成功地實現中央的計畫目標。(Mise, [1935] 1990) 彼得·柏特克 (Peter Boettke) 將企業家精神引入勞動市場，並認為勞動者不僅會在崗位上不斷地精進自己以追求高薪，或開發新的能力以獲取更高職位，也會在勞動市場中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以一展長才。

(Boettke and Luther, 2012)

米塞斯將行動人在當前社會的生產能力抽象成幾個理想型態，如研發能力、行銷能力、製造能力、溝通能力、財務分析能力、以及企業家精神。若市場可以完全分工，每一種能力可以對應到一種純類型的服務。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企業雇用了各種僅提供一項純類型服務的僱員，如研究人員、市場行銷人員、線上作業人員、公關人員、財務人員等。這些僱員會以柏特克的方式發揮企業家精神，累積各自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他們也會在勞動市場中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轉業機會，或自行開創新的企業。但在對經濟成長的論述上，加入這類企業家精神並沒離開新古典學派的架構，最多只是讓市場多了一點活力。

不同於新古典學派對經濟成長的論述，拉赫曼認為，真正推動內生經濟成長的動力是企業家以不斷重組異質資本的方式創造新商品。(Lachmann, 1955) 資本在本質上就是內嵌知識的累積。異質資本內嵌不同類型的知識，若以承載方式分類，呈現出實體資本、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等。生產過程就是這些異質資本的重

組與利用，其中更以重組提供不同純類型服務之人力資本為核心。(Baetjer, 2000)

人力資本既然內嵌於行動人，而行動人又擁有獨立的意志，彼此間若缺欠有效溝通，其能力勢必難以結合。換言之，各自僅擁有單一知識的行動人是無法結合的。成功的生產過程不僅有賴於有能力的創業家，也需要受雇者都能擁有多種知識：一種用於提供服務，其他的用於溝通。譬如，某些研究人員同時擁有研發知識與企業家精神，或某些市場行銷人員同時擁有行銷知識與企業家精神。

當受雇者必須在創新的生產過程中發揮企業家精神時，他們的表現將不再是柏特克的方式，而是可以分擔企業家的部分角色。在大規模生產的時代，受雇者最多只有在生產過程中發揮其人力資本的專業知識。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由於知識分工和創新需要異質知識的不斷重組，公司發展的遠景逐漸脫離創業者的視界和知識的範圍，有賴於兼具創業家精神之雇員的合作。他們不再是專業技師，也不再是知識勞工，而是谷歌公司所稱的“睿智創師”(Smart Creator)。睿智創師並非全新的概念。傳統上，會計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提拔表現傑出的雇員為事務所的新夥伴。他們在被提拔前的表現就是睿智創師，因為他們的成果塑造了公司的未來方向。只是在這個世紀，當所有的公司更加仰賴員工以其知識參與公司未來方向的決策時，勞動者將不再只是完全的受雇者。當他們開始分擔企業家的部分角色後，他們的薪資率也將不再完全決定於勞動市場，因為屬於企業家的角色那一部分並不存在市場。這是新時代的議題，也是奧派提供給勞動經濟學的貢獻。(Zheng, 2016)

其他的應用理論

奧派在復甦四十年後，埃德溫·多蘭 (Edwin Dolan) 自問：“參加奧派的人數增加了，也多了不少年青人，但我們活得很好嗎？”他對此問題提出三點自我評估：(一) 當前奧派是否有能力提出讓人們覺得是重要的問題？(二) 即使提得出問題來，是否也能提得出具有實際價值的政策，而不只是在理論上說說而已？(三) 即使能提出政策解方，是否能有別於主流學派和其他學派？(Dolan, 2014) 明顯地，多蘭期待奧派能朝向應用理論發展，最好能脫離傳統的兩大應用理論。當然，這對於已有 150 年歷史的學派是相當的困難，因為愈是遠離兩大應用理論

的新發展，潛在的爭議也愈大。

首先被嘗試的是政治理論。馬太·阿帕瓦羅雷 (Matei Apavaloaei)指出，米塞斯曾提過“一位波蘭哲學家，Tadeusz Kotarbinski，正在發展一門不同於經濟學或合作理論的新的行為學分支，稱為衝突與戰爭的行為理論。” (Mises, [1962] 2006) 他又提到，羅斯巴德早在 1950 年就主張將行為學區分成五個分支：(一) 被隔離之個人的行為理論，或稱魯賓遜經濟學，(二) 人際間情願交易之理論，亦即市場經濟學或交易學，(三) 戰爭經濟學，(四) 博弈理論，例如诺伊曼 (John von Neumann) 和莫尔根斯泰因 (Oskar Morgenstein) 的理論，(五) 其他未知的分支。(Rothbard, [1951] 2011) 後來，羅斯巴德將票決的邏輯分析也納入博弈理論。(Rothbard, [1962] 2009)。票決的邏輯分析一直是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的主要議題，羅斯巴德認同這學科，但不認同他採用社會契約論的分析。阿帕瓦羅雷把政治理論定義為探討政府為何要以壓制權力從民間獲取資源之理論。這的確是在行為學探討的範圍內。因此，他認為奧派早已開始探討政治理論，只是還未有更完整的發展而已。(Apavaloaei, 2015)

彼得 T·利森 (Peter T. Leeson) 認為法與經濟學也應該是行為學的分支。他在回顧當前的法與經濟學的兩大分支時指出，科斯支派探討給定之法律制度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如勞動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或反托拉斯法對經濟組織的影響，而波斯納支派則是利用經濟分析方法去探討法律與司法制度的可行性，如普通法在過失責任、契約、或財產權的條文內容等，也包括刑法和立法的程序。利森認為科斯支派因把經濟學範圍定義在僅以金錢交易的範圍內，排除了以法律與立法等非市場活動作為分析對象的可能，故只能以它們作為外生限制條件。相對地，波斯納支派允許法律與立法為分析對象，其範圍與行為學較為接近。因此，他認為奧派可以此為起點發展奧派的法與經濟學。亞蘭·马尔齐亚诺 (Alain Marciano) 說他並不反對利森的看法，只是反對波斯納支派的作法太超過，尤其是把本應該自然長成的法律也當作法官有意作為的結果。這些方向與議題的爭執正顯示法與經濟學尚有奧派的發展空間。(Marcian, 2012)

爭議較大的新理論是奧派的福利經濟學。(Cordato, 1992) 早在奧派復甦之前，羅斯巴德就提出以建構奧派福利經濟學去對抗新古典學派之福利經濟學。(Rothbard, 1956) 奧派復甦之後，柯茲納也有類似的提議。(Kirzner, [1988] 1992) 然而，甘尼培 (J. Patrick Gunning，音譯帕特里克·冈宁) 認為：羅斯巴德重建的

福利經濟學並不符合米塞斯的主觀論，而柯茲納的建議路線也違背方法論個人主義。(Gunning, 2004) 的確，要依據奧派的核心去建構第三個具一般性的應用理論並不容易，這使得嘗試者寧願選擇特殊領域的政策理論，如環保政策，反而容易掌握住奧派的原則。(Cordato, 2004) 譬如道森 (Graham Dawson) 便認為“奧派或自由人主義的政策必須朝向政策私有化的方向，廢除所有現存關於氣候變遷的立法。……相對地，法院必須建立一套普通法和足夠引導石化燃料之利用的判例。”(Dawson, 2011)

多蘭在這前提下提出奧派的環境政策，但毫不驚訝地也引起爭議。但他認為社會主義之經濟計算辨論的對象是實體資源，而非出現在環境議題的非實體資源，尤其是財產權的界定。此外，他提出兩點奧派應該建構環境經濟學的理由。第一、環境議題探討的是人們在利用實體資源時所出現的衝突，而這正是奧派可以應用協調理論的對象；第二、奧派對問題的解方在於尋找最適合之制度，異於新古典學派的極大化解方。譬如對於環境的汙染問題，作者認為奧派會支持汙染權的私有化。當然，來自內部的批判是免不了的，譬如瓦特·布拉克 (Walter Block) 很早就反對這類為了合理化對私有財產權之侵犯的假權利。(Block, 2004) 不過，多蘭認為：奧派論述應該關注的是真實世界之市場機制和真實世界之社會主義機制的比較，而非比較它們的理想世界。(Dolan, 2014)

毫無疑問地，奧派要進入政策理論，眼前還是荊棘遍野，只有盼望更有能力之理論創業家的出現和更多有勇氣的追隨者。

參考文獻：

Apavaloaei, Matei A., "An Outline of a Praxeological Theory of Politic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18(2), pp. 91-125. 2015.

Baetjer, Howard, "Capital as Embodied Knowledg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3, pp. 147-174. 2000.

Block, Walter, Review, "Environmental Markets: Equity and Efficiency," by Graciela Chichilnisky and Geoffrey Heal,"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7(2). pp. 91-97. 2004.

Boettke, Peter J. "An 'Austri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on Transitional Political

- Economy," *The Journal of Hayek Society at LSE* 6(2), 2004.
- Boettke, Peter J. and William J. Luther, "Labor Economics from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GMU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No. 12-41. 201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130999>.
- Boettke, Peter J. *Calc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Essays on Socialism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1.
-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Group. (1992)
- Colombatto, Enrico. "Is There an Austrian Approach to Transition?"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5 (1), pp. 61-74. 2002.
- Cordato, Roy, "Toward an Austrian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7 (1), pp. 3–16. 2004.
- Cowen, Tyler. "Austrian Welfare Economic,"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 Brookfiel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Dawson, Graham, "Free Markets, Property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How to Privatize Climate Policy," *Libertarian Papers* 3, pp. 1–28. 2011.
- Dolan, Edwin, "The Austrian Paradigm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17(2), pp. 197-217. 2014.
- Foss, Nicolai J., "The Theory of the Firm: The Austrians as Precursors and Critics of Contemporary Theory,"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7(1), pp. 31-65. 1994.
- Foss, Nicolai J.,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Modern Economics*,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4.
- Gunning, J. Patrick, "Austrian Welfare Economics? A Misesian Response."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constitution.org/pd/gunning/subjecti/workpape/auswelf.pdf>
- Hayek, A. Friedrich,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Heller, Michael,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Harvard Law Review*. 1998.
- Holcombe, R. G., "Firms as Knowledge Repositorie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6 (3),pp. 259–275. 2013.
- Holcombe, Randall G. " The New Urbanism Versus the Market Process,"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7(2/3), pp.285–300. 2004.
- Kirzner, Israel M. "Welfare Economics: A modern Austrian perspective", In Israel M. Kirzner, *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80-192. [1988] 1992.
- Lachmann, L. 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London: Bell and Sons. 1955
- Lai, Lawrence Wai-chung, "Spontaneous Catallaxis in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Under Planning by Contract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Ideas of Hayek and Mises at Work in Town & Country Planning in Hong Kong," *The Review of*

- Austrian Economics* 17(2/3), pp. 155-186. 2004.
- Langlois, Richard N., "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firm :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6 (3), pp. 247-258. 2013.
- Leeson, Peter T., "An Austrian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uperintitition,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5, pp. 185-198. 2012.
- Lewin, Peter and Howard Baetjer, "The Capital-Based View of the Firm,"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4(4), pp. 335-354. 2011.
- Lucas, Robert,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pp. 3-42. 1988.
- Marciano, Alain, "How For an Austrian Law and Economics Should be Posnerian? A comment on Peter Leeson,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5, pp. 351-354. 2012.
- Mises, Ludwig von,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Friedrich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Sons. 1935. Reprint, Auburn, Ala: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0.
- Mises, Ludwig von,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 Bettina Bien Greaves,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62] 2006.
- Rothbard, Murray N.,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Utility and Welfare Economics" In Mary Sennholz ed.,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New Jersey:D. Van Nostrand. 1956. Reprinted in Rothbard, *The Logic of Action I: Method Money,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7.
- Rothbard, Murray N., *Economic Controversies*. Auburn: L. von Mises Institute. [1951] 2011.
- Rothbard, Murray N., *Man, Economy, and the State with Power and Market* 2nd ed., Auburn: L. von Mises Institute. [1962] 2009.
- Schmidt, Eric and Jonathan Rosenberg, *How Google Works*,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4.
- Yu, Fu-Lai Tony. " Toward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Transition," , *Philippin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2003,30(2).
- Yu, Fu-Lai Tony. "A new Perspective on Transitio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F. L. T. Yu,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 Zheng, Wei-Lin, "Praxeological Theory of Labor and Wage," ASSC. 2016. Available at <http://austrianstudentconference.com/wp-content/uploads/2016/02/ASSC-2016-Zheng-Wei-Lin.doc>